

机会在文化舞台上大放异彩。我在书里也写到：“‘屏’有两个作用。其一是对视线的阻挡，对物的隐藏；其二则是它可以作为‘表征’，对隐藏于其后的诸般特性进行图像般的呈现。”

《新民周刊》：您刚刚谈到湖北梁庄王墓，之前一直看的是文字史料，看到实物时是不是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柯律格：是的。历史资料 and 记录总是为我们描绘一个大一统的和谐天下，告诉我们所有地区几乎都一样，例如《大明会典》或《明实录》，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出发，把整个帝国描写成很光滑的一个平面，山东、湖北、四川没有区别。当然也有地方志，但相当少。所以实物的证据就变得非常重要，例如山东朱檀墓和湖北梁庄王墓，墓的设计、出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大明会典》中有关于藩王墓葬的详细规定，好像所有藩王墓都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出土的东西证明了它们可以截然不同。这就是我为什么看到梁庄王墓会那么激动。

《新民周刊》：与藩王皇家相对的，是江南文人。您的《雅债》一书，从文人社交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画家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您觉得这是儒家理念在生活中的具体反映吗？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却常常有出世的向往，您觉得这只是逢场作戏故作



左图：明仇英秋山隐逸图。

姿态，还是中国文人内心真实想法的反映？

柯律格：如果你认为我这本书有新的创见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不认为这是唯一存在的研究方法。像文徵明这样重要的艺术家，有许多方法可以研究他和他的作品。当然，儒家的社交理论强调血缘关系和人脉关系（虽然与此同时，像王阳明这样的儒家理论家也强调了个人教养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怀疑中国明代文人要撤退到更简朴生活中去的冲动的

真实性，我也老想离开这喧嚣的都市，走入平静的田园（正如许多学者所做的那样），可是我还是回 email。问题的关键在于，有时候，这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性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虚伪。

《新民周刊》：文徵明和拙政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文徵明为拙政园画过著名的《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和《拙政园十二景图》，他有没有像倪云林那样参与到园林的设计中去，还是说只是记录了园林的风景？

柯律格：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另一本书《明代中国的园林文化》详细讨论过了。没有证据表明文徵明在拙政园的设计过程中做了些什么，我确信他没有参与其中。拙政园的主人王献臣的年纪要比文徵明大得多，算是上一代的人，对于文徵明一生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人。1490年，文徵明（那时候仅仅20岁）为一本苏州文人献给王献臣的诗集写序，他本人也有很多诗是写给王献臣的。王对文徵明来说是个长者，同时也是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所以当他1533年开始绘制《拙政园三十一景图》时，他和王献臣家族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关系也很密切。这种关系，一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一部分还晦暗不清（就像所有古代的社交关系一样）。民